

英国人乔治·何克：把一切献给培黎学校

□ 吴耀明

1938年7至10月，何克亲历并向世界报道了武汉会战，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的《帝国操纵之我见》一文中，揭露了西方列强面对日军侵略行径，只顾自身利益、不保护中国人反而阻止中国军队行动的势利行为。

1939年3月，何克从北平前往晋察冀采访，路过曲阳县一家旅店时突染伤寒，恰遇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救了他一命。何克在宋家庄诊所养病一个多月，看到这里的人们虽然缺衣少食、生活艰苦，但无一不投身抗战，顿时肃然起敬。康复后，应聂荣臻邀请访问晋察冀边区，他看到“自卫团”“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组织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认识到人民是抗战的基础。他观察到，和国民党官员混日子完全不同的是，边区官员一直踏踏实实工作，帮助人民解决实际问题，由此对共产党心生敬佩，认为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9月，到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接见，他还遇见了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赖朴吾和林迈可，三人结伴南渡黄河后乘火车到达西安，林迈可由此回北平，何克和赖朴吾前往宝鸡。

通过几次采访，何克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更努力地报道中国人民抵御外辱的正义事业。除了给中外报纸和通讯社写稿外，他还把见闻写成书，1945年以《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为名在英国和美国出版，预告了必将诞生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他在书中写道：“西北是我考察新的中国诞生的理想之地，这里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惊人的创造力。”他还在另外一本未出版的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带头使中国走向民主和抗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何克不止一次地说，中国共产党是有前途的，他会永远留在中国，直到和中国人民一起把伟大的抗日战争事业进行到底。

把一切献给培黎学校

到宝鸡后，何克被任命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的外事宣传秘书。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到陕西、甘肃、山西、河南等地考察合作社发展情况并写成新闻报道，为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工合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何克觉得这是一份“可以把工业和社会建设相结合的工作”，认为自己与工合“结婚了”。1941年7月15日，刊物《工合战士》上登出的《洋秘书何克先生》一文写道：“他（何克）负责起草各项英文报告与宣传文件工作，日夜不停地苦干……他痛恨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他不计报酬，不辞艰苦，愿为中国这个新兴事业——工合运动服务。”这篇文章反映了何克苦干实干的拼劲儿，也充分展现了“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

1940年，为了给工合运动培养后备人才，艾黎在陕西双石铺筹建培黎工艺学校，学校开办之初，由于条件艰苦、报酬不高，一年内有八任校长离职，直到何克被任命为校长，各项工作才得到改观。何克一上任就带头修缮校舍，以身作则，发扬实干精神，学校很快走上正轨，呈现生气勃勃的景象。何克对学生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普遍尊敬和好评。他秉承学用结合理念，一边组织上课学习，一边坚持生产劳动，为中国工业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何克不仅担任校长，还兼任英语、音乐、体育三门课的老师，写了《培黎工艺学校校歌》，歌中唱道：“我们生活，我们学习，我们生活学习在培黎；工业技术都具备，求知生产不相离。”歌词生动反映了培黎“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宗旨。1943年，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访问培黎学校后，评价何克是“天生的教育家”。

1944年11月，随着日军西进威胁，加之国民党对培黎学校的监视迫害，为了学校和学生安全，艾黎和何克决定迁校到甘肃省山丹县。此时正值寒冬时节，何克带领师生们冒着风雪，翻山越岭，跋涉1100公里，于1945年3月抵达山丹。随后又投入到山丹培黎学校的建设工作中。直到1945年7月22日，何克因意外染上破伤风，竟然英年早逝，临终前，他写下了遗言：“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

何克一生未婚，却收养了4个中国孩子，并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艾黎对其评价道，“他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信念而捐躯的，他是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的纽带，他的英名永存。”何克一生只走过了30年，但他不在乎功名利禄、放弃安逸生活的毅然选择令人动容，为正义而奋斗终生、为理想而无私奉献的崇高追求超越时代，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已经流芳百世，他的英雄事迹必然被中英两国人民永远怀念。

狮子形象：“征服者”或“吉祥物”

□ 马欢欢

大约12万年前，狮子首次占据欧亚大陆；2万多年前，亚洲狮第一次从北非进入亚洲，到达欧洲南部、近东和印度半岛，成为地球上分布最广泛的大型陆地动物之一。作为群居动物，雄狮在狮群中负责守卫领地，而雌狮则负责狩猎和照顾幼崽。因此，在西亚、北非等大部分狮子原产地，狮子一直是忠诚的“守卫者”，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狮子文化中，被不断地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狮子往往是强大的征服者，而在中国，狮子更多是镇宅、祈福的吉祥物，这种文化差异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西域以西 狮子走进人类文明

人类对狮子最早的描绘是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构成的两河流域，约5200年前，因其南部孕育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而备受瞩目。在文明出现之前，其实两河流域北部的文化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约1万年前，两河北部哥贝克力遗址T型石碑上，大型猫科动物的浅浮雕显示出人类对兽中之王野生力量的崇拜。约6000多年前，人类与狮子搏斗的形象出现在两河流域北部哈拉夫文化晚期的彩陶上，体型硕大、腾跃而起的猛兽突显出人类体格上的弱势，反衬出个人的英勇和征服欲。6200多年前，两河流域北部聚落规模快速增长，考古学家在印纹块上发现了狮子、狗和长角动物组合的场景。可以看出，随着史前最早的城市化，狮子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而500年后，在印纹块上再次发现猎狮的场景，这一次，人类身形魁梧、镇定有力，颇具“王者之风”，被认为是最早的“王”的形象。考古证据显示，此时

两河流域北部的中心城市已具有集权行政系统，并出现类似“王”的强有力的领袖，而这比南部苏美尔文明早了几百年。

自此，英雄主义和猎狮文化成为西亚经久不衰的主题，在苏美尔文明的滚印、早王朝的楔形文字泥版、巴比伦官殿的浮雕、萨珊王朝的银盘以及神话史诗中不断出现。不论是苏美尔史诗中半人半神的吉尔伽美什，还是希腊神话里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都曾手刃巨狮。猎狮成为定义英雄人物的高光时刻，预示其将成为征服者。

在成书于公元前的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中，大卫年轻时为守护羊群杀死过狮子，预示着他会成为征服者和王者。到古罗马时期，斗兽场上欧洲角斗士们和狮子作着殊死搏斗，正是英雄主义和猎狮文化的极端表现。

不难看出，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继承了西亚史前文化对狮子力量的崇拜和征服者为王的思想，并深深地刻在了西方文明的基因中，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迢迢万里 从欧亚大陆西侧走到东侧

中国人对狮子形象的认识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但见到活生生的狮子，要归因于西汉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史书记载，东汉时期安息王遣使进贡狮子。从万里之外把狮子带到洛阳或长安，其难度不亚于唐僧的“西天取经”，只不过全程守护的不是孙悟空的通天法力，而是中原王朝与西亚、中亚各国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一时期，远道而来的狮子只是皇家苑囿中的稀有动物，除了皇亲贵族，一般老百姓接触不到。它们的到来虽然彰显了中原王

朝在欧亚大陆上的影响力，但对中国文化并未产生太多影响。

狮子走入中国传统文化，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佛教传入中国，在佛教中狮子是释迦牟尼的象征，更多宣扬非暴力、宽容和尊重生命。有学者研究发现，早期佛教造像的狮子都是雄狮，从北齐开始，部分菩萨造像的狮子座上不再是一对雄狮，而是一雄一雌两只狮子。雌雄双狮的图像很可能就是中国文化讲究阴阳平衡的思想在艺术上的体现，是狮子文化融入中国传统的本土化产物。另一方面，萨珊波斯文化从中亚一路东传，带来了

对狮子力量的崇拜和猎狮的图案，但是并没有被中国文化吸收。隋唐时期贡狮到达高峰，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狮戏和狮舞从龟兹等地传入中原，不仅风靡于宫廷之中，在民间也颇为流行，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狮子的形象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建筑和器物上，被塑造得越来越世俗化，并演化出千姿百态的图样。

到宋元时期，由于陆上丝路不畅，开始通过海路贸易贡狮。到明前期随着中原与西域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贡狮再次达到高潮。郑和下西洋期间，曾带动西亚、东非沿海国家从海路贡狮。

风云巨变 狮子何以消失在帝国的版图

明中期以后极少有贡狮的记载。表面看是士大夫阶层思想的保守，宣扬“不贵异物”，称贡狮会使外臣看见皇帝真容，出现遣返和却贡，实际则是明后期经济衰退，再也无力支撑这种“面子工程”。迢迢万里的贡狮需要中原王朝和贡狮国及沿路国家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作为支撑。纵观当时的国际环境，随

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风云巨变，西方势力不断深入亚洲腹地，东方帝国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显著下滑。而亚洲狮最主要的原产地——西亚的波斯帝国在沙俄和英国的两面夹击下，大批领土被瓜分蚕食。长期以来英雄主义和猎狮文化的流行以及西方殖民者的狂捕滥杀，使亚洲狮数量骤降并在大部分地区迅速灭绝。目前，仅在印度的保护区残存少量亚洲狮。可以说，狮子几乎同时消失在欧亚大陆两侧的波斯帝国和大清帝国，为两个帝国相近的命运刻上了悲剧的脚注。

与作为动物的狮子命运不同，融入人类文明的狮子文化并未衰退，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在东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纵观1万年的人类文化史，如果说狮子文化在西方文明基因中根深蒂固，是因为它在文明产生之前就走进人类文化，并见证和参与文明起源、孕育及发展的整个过程，那么，它出现在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本身就是一部记载2000多年来欧亚大陆东西两侧文明交流互鉴的壮丽史诗。在这个过程中，狮子从欧亚大陆的西侧走到东侧，从威严的雄狮到吉祥可爱的雌雄双狮，既是不同文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生动写照，也体现出中国文化在吸收借鉴的过程中，选择性地去除其“征服者”的含义，保留“守卫者”的传统，同时增添了更多宽容慈悲和欢乐祥和的寓意。可以说，狮子虽来自西亚，但中华文明中的狮子文化却是中华民族思想的集萃和智慧的结晶。



鉴真东渡与盛唐文化的传播

□ 余大庆



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出国传经送宝，并且取得杰出成就的，鉴真可说是第一人。以往外国僧人来中国传教也好，中国僧人去国外求学也好，都是单一的传教与取经。鉴真东渡不但弘扬了佛法，而且把盛唐优秀的文化传播到日本。鉴真每次渡海，除了携有海粮等必需的生活物资和数以千百计的佛像、佛经外，还带去了漆器、玉器、绣品等大量工艺品，以及数量可观的药材、香料、蔗糖、钱币等。为了能将丰富的文化传播到日本，他还带了一批画师、绣师、雕刻、铸写、修文、玉作匠人及烹饪师等工匠和艺人，组成了一支文化传扬团队。

这支队伍能够组建起来，与扬州这块人才高地有着莫大的关系。扬州是东南佛教中心，名僧荟萃。鉴真随行弟子，除扬州本地的僧侣外，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外国有一技之长的僧人。这对信息不畅、交通闭塞、经济萧条、文化滞后、人才缺乏的都市来说，无疑是很难做到的。而繁华昌盛号称“扬一益二”的唐代扬州，为他提供了东渡弘法、传播文化的良好条件。

他从扬州带去的许多艺人匠师更是发挥了很大作用。鉴真到日本不久，便带领工匠与日本僧众团结合作，建造了戒坛院、唐禅院和唐招提寺。建筑是立体的诗，凝固的音乐，也是当时佛教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盛唐时佛寺的建筑、佛像的雕塑和绘画，都具有很高的

技术含量和艺术水准。鉴真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早在两京求学时就对其进行了细心观察和深入研究。他在建筑、雕塑、绘画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才能，在建造著名的唐招提寺时得到充分的展现。唐招提寺内的大堂建筑，坐北朝南，阔七间、进深四间，三层斗拱式形制，是座单檐歇山顶式的佛堂。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中评论说：“金堂乃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由于鉴真僧众采用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因而这座建筑异常牢固精美，经过1200余年的风雨，特别是经历1597年日本地震的考验，在周围其他建筑尽被毁坏的情况下，独金堂完好无损，至今屹立在唐招提寺内。金堂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最有价值的珍贵实物之一。鉴真等人高超的建筑、塑像、雕刻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发挥，给日本留下了一批艺术珍宝，唐招提寺的许多殿宇、佛像都被列为日本国宝。我们今天要看原汁原味的唐代建筑，只有去奈良。

扬州历史上不乏杏林高手。华佗的弟子吴普就是扬州人。他积极推广华佗的“五禽戏”功法，著有《华佗方》10卷，又搜集前人医术，辑《神农本草经》6卷，在民间广为流传。时至唐代，扬州又成为中外药材的集散地。鉴真东渡前，就在长安向宫廷太医学习医术，回扬州又广为应用，救济贫病。他的医药

知识和医疗技能远近知名。他在医药方面有两大特长：一是药物辨别和炮制；二是搜集验方。鉴真初到日本，就治愈了光明皇太后的疾病。756年，圣武天皇患病，有上百名精于医术的和尚给他看病，其中鉴真等人的诊治效果最好，为此受到朝廷的褒奖。761年10月15日，弟子法进在日本大安寺讲授鉴真的医药法。鉴真还著了一部《鉴上人秘方》，其中的一些验方流传至今。隋唐年间，虽中国医药知识及医药典籍相继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对于药物的收藏、炮制、使用、配伍等知识，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日本人。据日本《皇国名医传》里指出，自鉴真东渡日本面授医药知识，使日本人真正掌握辨识药品之知识，日本医道才完备。鉴真在医学方面的作为，使得日本医界在14世纪前一直奉鉴真为始祖，直到德川时期以前，日本人还把药袋上有没有鉴真像当作辨别真药假药的依据。鉴真亲自带到日本的“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等几乎成为日本民间的常备药。

中国书法传入日本较早，但盛行中国书风还是在鉴真东渡之后。

鉴真带入日本的大量佛经都是手抄的，本身就是汉字书法作品。经过日本僧侣的传抄，书法唐风也便随之盛行起来。鉴真东渡时还带去了中国国宝——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人的书法真迹50多帖，大大推动了当时日本佛教和民间风行的“王体”书法。孝谦女皇题的“唐招提寺”匾额就是王体，至今日本还珍藏着鉴真带去的王羲之字帖。

鉴真从扬州带去的僧人中，不乏文艺人才、丹青高手。鉴真和他的弟子在日本都是用汉语讲学，使日本僧侣广泛学习汉语，大大普及了汉语知识，为古代日本人吸收中国文化提供了很大方便，对日本汉字文学的发展也是一个推动。其实，奈良时代日本举国上下追慕唐风，鉴真文化传播功绩之丰，是怎么估量也不为过的。以唐诗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作品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文学产生了全盘唐化的倾向。

鉴真还把中国的印刷术和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传到了日本，如豆腐店的老板就以鉴真为祖师。自从西汉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制作技艺之后，民间特别是寺院盛行豆腐烹调技法。鉴真东渡带去了豆腐制作技术，并从寺院传到民间，所以至今日本还奉鉴真为豆食制作祖师。

鉴真东渡日本，把盛唐文化全面地介绍给日本，对日本的佛学、医药学、文艺创作、工艺技术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因此称他为过海大师。